



《唤醒沉睡的南宋》，讲述杭城考古动人故事 跨越时空，与文物对话

本报记者 林晓晖

博物馆里，与千年之前的文物对视的那一刻，你是否也好奇：它是如何从层层深埋的泥土里展露，又是经历过怎样繁复的考证和修复，最终闪耀于眼前？考古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每一个文物破土而出的瞬间，每一处重现天光的遗址，他们都是第一眼的见证者。

近日，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杜正贤的新著《唤醒沉睡的南宋》正式出版。当了数十年的考古队长，拥有五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的他，是第一次写下考古回忆录。

战国的水晶杯刚开始被误认为盗墓者的遗留物，从南宋御道窥见古临安的城市轮廓，在卷烟厂里找到了岳飞的“办公室”……耳熟能详的考古发现背后竟有如此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书页翻飞之间，仿佛能听见声声遥远的呼应。

考古现场的“独家花絮”

考古发掘通常被人们记住的，是文物出土的那个瞬间。

实际上，更多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在这个瞬间之前。全书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聚焦于杜正贤亲自主持发掘的五项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的南宋临安城相关遗址。

具体到每个项目，杜正贤用更多的笔墨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己亲历的过程：前期复杂的勘探、测量工作，以及在发掘、保护过程中如何与时间赛跑，甚至还有许多与盗墓者斗智斗勇的插曲，这些其实都是考古人的“家常便饭”。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址，一座典型且完整的宋元古窑，出土了数十万块瓷片、数千件可复原的瓷器，轰动全国考古界。而它的发掘起始于古玩交易市场的一个“可疑”的摊主。

1996年9月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深夜造访杭州考古所，告诉杜正贤，自己是古玩收藏爱好者，在古玩市场遇到一位新来的摊主。奇怪的是，他不懂行，却常常带来一些南宋官窑的碎瓷片，一旦卖完就像躲着人似的立刻就走。为了找出真相，多名古玩爱好者几度跟踪，终于在凤凰山发现了踪迹。

原来，是一场洪水沿着山边的渠沟猛力冲刷，使得一些瓷片露出了真容。当地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并将捡来的瓷片拿到古玩交易市场上贩卖贴补家用。

“这些瓷片真的是宋代官窑残存吗？”循着这线索，杜正贤和团队一锹一铲、向下挖掘。终于，凤凰山麓的两座巨型堆积坑，以及坑里难以计数的官窑瓷片，向世人投来惊艳一瞥。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有许多。遥远的考古工作

变得具象起来，就像拍摄一部纪录片，用更小的“景深”聚焦这些微小的人和事。杜正贤笔下的考古人，不是定格在一个个在探方上的剪影，他写下他们每一次经历的心路历程，还有酸甜苦辣的个中滋味，是那样鲜活而丰满。

“考古人一开始进墓葬，也是会害怕的！”杜正贤回忆起当时被点名第一个进入吴越康陵墓，“那是一种激动、忐忑、期待交织的复杂心情。墓穴漆黑一片，气味浑浊刺鼻，那种后背发凉的感觉至今都难忘。”

“十墓九空”是考古人常常面临的挑战，意思是，挖掘的墓葬常常已被盗墓者捷足先登，或者留下来的随葬品也只是少量。考古人很可能花费一番大功夫但是“颗粒无收”。

杜正贤把这些困难和失败、并不成熟的想法、几经辗转的过程，都诚实地记录在书里。

“科技已经改善了很多考古工作的条件。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考验恒心和耐力的挑战都是始终要面对的。”杜正贤希望通过放大考古工作的细节，提供一种经验方向上的指引，也是一种真诚的鼓励。“考古，是持续而反复的探求过程，欲速则不达。听听过来人的故事就知道，这事儿是急不得的。”

连起文物的生命线

考古挖掘，保护修复，公共展陈，这是一件文物完整的生命线。

1986年，杜正贤开始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2005年，调任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科科长；2015年，再度调任杭州博物馆馆长。

说来是个神奇的巧合，杜正贤职业生涯的三个阶段，在文博系统内的三重身份，刚好贯穿了这条生命线。

所以，他对于这些亲手挖出的“宝贝”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始终以考古人的眼光理解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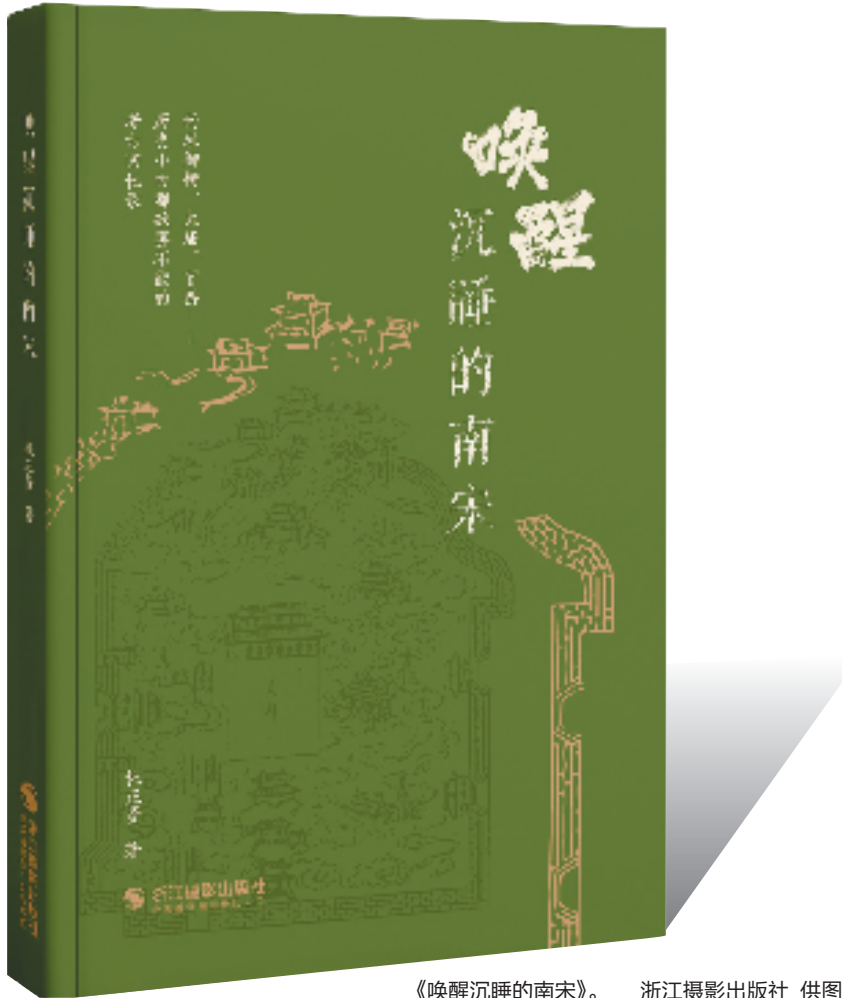
考古人的视野有何独特之处？杜正贤在书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考古所追逐的并不是器物，而是古代所有遗留痕迹背后的历史真相。在书里，文物的生命不是仅仅停留在出土的一瞬间，而是有完整的后续。他觉得，讲好一个文物的故事，一定要有逻辑，比如，给它建立一个时空坐标。

杜正贤举了个例子，他在担任杭州博物馆馆长时，给出土于杭州朝晖路窖藏的元代瓷器办了个展。在策展的时候，他便想，不仅要呈现单个窖藏，更是要梳理全国同时期窖藏的器物，将其置于历史坐标中去呈现。这个展览分为五个单元，杭州元代的龙泉窑、景德镇窑、霍县窑、磁州窑，同一时期、不同窑口窖藏瓷器串珠成链、遥相辉映。

另一种坐标，书中称之为“古今重叠”。年轻时，杜正贤便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他认为，这是了解一个城市最便捷的方



杜正贤(左二)为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左三)介绍南宋太庙考古发掘现场。杜正贤 供图



《唤醒沉睡的南宋》。浙江摄影出版社 供图

式。走得多了，在地理分布上，他便能将现代杭州与古籍中的临安城一一对应，脑海中构建出一幅立体层叠的古今杭州地图。

吴越国与南宋的两朝古都、东南富庶之地，杭州城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文明遗迹。

在书里，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对照：如今杭州上城区的河坊街荷花池头一带，曾有过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南宋第一衙门——临安府治；如今游客熙攘的南宋御街当时是南宋临安城的中轴

线，“近坊灯火如昼明”的烟火人气绵延近千年。

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林青松说，这本书形象、系统地复原了南宋临安城的原貌和风采，将史书中模糊的、资料中遥远的临安城更加清晰和近距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宋韵文化”不只是个概念，而成为可知、可感、可传承的精神血脉。

所以，如果想要熟悉杭州城的前世今生，不妨跟着这本“导览”走一走。去感受、触摸和想象：那些著名的地标

在当时都是何等的风姿绰约，巍巍高楼之下又深埋着怎样遥远而动人的故事。

迈向“大众考古”的一步

“它是向文物考古大众化迈进的一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在序言中这样评价。

这几年，考古相关的节目在电视和网络上热播，考古学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人们对考古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求也随之高涨。

写一本大众化的考古学科普读物，这个想法在杜正贤心中已经酝酿许久。他曾经就亲历的重大考古发现写过不少著作。如今看来，这些专业书籍确实有些晦涩，仍然是在较小范围内的圈内人流传。“应该写一本让更多人理解考古的书。”受聘成为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后，杜正贤下了决心。

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就在《读书》杂志上以《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我们学习考古的人常常被问及各种各样的问题，提问的人既有研究历史方面的专家也有普通的公众。”

事实上，如何推动“大众考古”，一言以蔽之，就是考古学家如何回答好大众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里，并未设置高不可攀的学术门槛，而是有大量考古知识的科普。多学科的知识被有机连接在一起。考古过程中，哪怕是“挖土”这样简单的事情，杜正贤都为此说明它的行为逻辑——挖的土每一寸都有讲究，遗址的底层堆积分为五层，从现代层开始层层向前一个朝代推进……无论是否具备相关背景知识，都能借此轻松踏入这扇通往古代文明奥秘的大门，体会那份来自历史深处的震撼与感动。

往事历历在目，从梳理到成稿，杜正贤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进度过半的时候，他特地找来几位中学生试读。“年轻人谁喜欢考古？”当时身边还有朋友这样打趣。但是杜正贤觉得，中学生的评价能很好地体现这本书是不是真正能拉近大众与考古的距离。

结果令他意外。“下一章呢，下一章什么时候出？”年过六旬的“杜伯伯”被小读者们频频“催更”。出版之后，不少读者评价，这是让考古“小白”都欲罢不能的读物。

考古学这三个字，从拉丁词根“arche”来，本来就有“探究本源”的意思。它关系到城市、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探求，所以也应该面向更广泛的人群。杜正贤在后记中写道，正如西拉姆的《神祇、坟墓与学者》所言：“考古学家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干涸的泉源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

书讯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著
中华书局



作者首次全面梳理自己四十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其中记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寻找的艰辛，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与感悟。这是一份一流学者的学术成长记录，也是敦煌学入门读物、国际敦煌学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史记里的中国》

赵宗彪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该书以随笔的形式，将《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娓娓道来，不仅展现了司马迁笔下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更通过作者的独到见解，为读者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深刻哲理与现实意义。

《细读金庸》

吴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以历史为切入点解读金庸，借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部分生动细节进行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考证，丰富我们对人物的想象。书中收录40余篇文字，涵盖日常用品、社会制度、美食饮品、武器武功等七大主题，揭开古代社会生活的层层面纱。

《大国的命运》

包刚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该书阐述了大国发展可能面临的五个阶段，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通过对具体大国案例的分析解读，构建了一个理解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崭新理论框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很强的现实意义。

诗意是文学的核心

彭程

一个文学写作者，尽可以选择某一种或某几种适合自己的文体，但只要他有追求及悟性，那么不论从事的是哪种文体，早晚都会与诗相遇，会在一切样式的产品中寄寓和表达诗意。

文学样式大略都可以归入抒情言志和叙事两大门类。前者主要体现在诗，后者则以小说为代表，其他样式偏重于二者之一，或者视具体情形而各有侧重。不过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诗意，是所有文体的优秀作品都应该具有的本质。

这一特性，牵涉到一个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名义上论的是诗歌，其实是一部广义的文学论。他指出，诗是文学的内核，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体现为什么形式，都具有诗意这一根本性的特质。对于这一点，中外古今都有相似的论述。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说过：“我永远不知道，哪里是散文和诗歌的界限”。智利诗人聂鲁达比喻：“小说是

文学中的牛排，是人们使劲想要吃的菜肴。而诗歌是最后才上的一道菜。”美学家朱光潜归纳表达：“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一部好戏剧都要当成一首诗来看”。

那么，这种被一致推崇奉为圭臬的诗意，其涵义是什么？这又是一个颇费舌头的题目。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优秀诗歌给阅读者带来的一种富于美感的意境。它们包括许多成分，或者说依赖于多种因素的成就，诸如情绪的真挚饱满、感受的真切深入、风景的真真如画，以及将所有这一切描绘表达得出神入化的出色语言。

这里我想谈一本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书，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是一部影响巨大、被很多作家称为自己的文学向导的散文随笔集，贯穿于全书数十篇作品中的一条内在脉络，就是记录了许多著名作家对诗意的感受和追求。他们的作品得以不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饱含了浓郁的诗意。

端的小说中略举数例，聊作说明。我们不必称赞一个诗人的作品诗性鲜明，就像不必赞美一位铁匠锻造出了合格的铁器，这是他的职责。但一个主要以叙事文学写作安身立命的作者，如果其作品中闪烁着诗意的光芒，往往会让人高看一眼，他的荣誉徽章上也更有亮度。譬如说一部长篇小说具有史诗品格，这是十分高的评价，这种表述中就暗含了对于诗性的认同和景仰。

仅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诸多篇章的风景描写，笔触简洁洗练，寥寥数语，却生动传神，氛围感强烈，有力地助推了主题的表达。在《故乡》中，返乡途中的作者望见了深冬季节颓败破败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在酒楼上》中，“窗外只有渍痕斑斑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铅色的天空中飘舞着零星的雪花。这些荒凉枯寂的景色，都有力地衬托了主人公的落寞阴郁的心境。

当然，也有明快欢快的情绪，它们只存在于童年的记忆中，像在《社戏》

里，夏夜的水乡，疾驶的小船发出激水的声音，豆麦和水草的清香迎面吹来，月色和水气交织成为朦胧的一片；在《故乡》里，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照耀着海边长满了西瓜的碧绿的沙地。美好动人的画面，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写照，强烈地反衬出了当时生存的晦暗、绝望、令人窒息。

这样的举例可以有非常多。沈从文的《边城》，通过描写一个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湘西地区明丽纯净的山水，善良淳朴的人们，未曾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玷污的原始淳朴的美。小说中美丽的画面比比皆是。虫声繁密，月色如银，翠竹茂密，动人的意境中展开的是一首讴歌人性美的诗篇。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众多，大多已经湮没无闻，但孙犁的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却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中处处弥漫着诗意。这些被誉为“诗体小说”的作品，以其出色的审美格调，成就了恒久的生命力。

用诗意的标尺来衡量外国作家，最常被人们提到的是契诃夫。这位短篇